

2 0 世 纪

20

思 想 家 文 库

蒂里希 选集

上

Paul Tillich



上海三联书店

20世纪

20

思想家文库

蒂里希 选集

上

Paul Tillich

何光沪 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



蒂里希选集(二十世纪思想家文库)

著 者/蒂里希
选 编/何光沪

责任编辑/倪为国
装帧设计/姜 明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桑健儿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050 千字
印 张/46.125
印 数/1—5100

ISBN7-5426-1215-8
B·104 定价 83.00 元(两卷)

总 序

百年来,汉语思想学术在西方思想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改制变迁中,甚为遽然,其表征之一是思想与学术的分离:思想流於空疏浮论、学术坠於虚实不侔。

汉语思想学术的原祖孔夫子曾“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子告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术与思想应在精深与慎笃中相互促动。晚清思想大师(康、章、梁)无不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精深的造诣和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在“主义”论争中则鼓励了一种浮惑不根的思想学风。

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处境尤为艰难,此不为汉语思想所独然,西语思想同样面临诸多改制难题;然本世纪的西语大思想家无不在某一具体的学问领域有切实的推进功夫,慎笃思索的思想家型的学者或学者型的思想家辈出,以实在的学问运思社会和思想的现代困境,其思想学术琼瑶之精固非砭砭所能紊。

二十世纪的西语思想学术形态,学以社会理论及新兴学科为大统;汉语学界过往偏重哲学思想家,疏略政治学思想家、经济学思想家、历史学思想家、语言学思想家和人类学思想家,故对本世纪西语思想学术之把握,终以自蔽。

晚清知识人开创的泰西学典汉译,乃汉语学界百年未竟之业。时值二十世纪末,西学汉译之业尤当注重社会思想在本世纪

2 总 序

之铢积寸累。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负有综合谐调之命,改制诤证之累:一者须谐调技术性知识、实证性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宗教知识之间的紧张;二则须谐调古典知识与现代知识之间的紧张;对汉语学术而言,尚有谐调中国文教传统与西方文教传统之紧张。然而,汉语思想与西语思想之关系,根本上不是民族性竞争关系,而是现代性处境中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两种语言织体中前行的思想学术均面临根本的现代性难题: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之正当性的重新论证。因而,创设“二十世纪思想家文库”所系重大。

学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致者?本世纪西方思想学术论著汗牛车,充栋宇。汉语思想学术的未来,将应在汲纳二十世纪泰西学术思想的荦荦大者中胚孕。

策划编辑这套文库,旨在为全面了解二十世纪西语思想学术提供基本而精当的汉译文本。选编者均为研治有年的专家,理应反映汉语学界对二十世纪西语思想学术的认知水平。编、译者盼此渺焉之成绩,益於汉语思想学术之宏远;选题挂漏或汉译舛误之处,亦盼海内有识之士垂察赐教。

是为序。

编 者

1996年10月3日于上海

· 编者前言 ·

保罗·蒂里希及其哲学神学思想

何光沪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纽哈莫尼(New Harmony, Indiana)的保罗·蒂里希公园里,在这位思想巨人的一座小小陵墓旁,在他的一座半身塑像上,镌刻着《诗篇》第一篇的这几句话:

他像植在溪边的一棵树,

按季节长出果实,

叶子也不会枯干……

我从未去过美国,并未亲自见到这座墓、这座像和这些铭文。我读到这件事的那篇文章^①提到塑像之建立和铭文之镌刻时,用的是“将来时态”。但是,即使这件事并未完成,即使我永远不会亲见,这座像也已耸立在我的心头,这首诗也已铭刻在我的心上——这些景像现在就浮现在我的心里。本来,现在就最虚幻

① J. Heywood Thomas's Introduction to "On the Boundary" (Collins, London, 1967).

——因为它只是未来向过去的转变；但是，现在又最实在——因为我们只生活在现在。（关于其中的道理，这本《选集》里的“永恒的现在”一篇，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蒂里希逝世整整三十年了，但是，他的思想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未来，更是属于现在。因为，正如另一位哲人所说，伟大的人物被人记住的似乎只有名字，但实际上他们的作为，已经同宇宙本身交织在一起。（我看这话也适用于“小人物”，因为小人物同大人物的唯一区别，只在于记住他们名字的人较少，人们认为他们的作为较小而已。）如果说，前面的诗句可以使我们想起似曾相识的中国诗句“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那么，我就不得不说，就任何一个能读书的人而言，倘若他在“行休”之前未能好好读一读蒂里希，未能好好看一看这棵大树那欣欣向荣的枝叶，尝一尝它所结出的意味深长的果实，那乃是他人的人生一大憾事。

H. 理查德·尼布尔曾说：“阅读（蒂里希的）《系统神学》，可以成为一次作出发现的伟大航行，这次航行所进入的，是对于在上帝的奥秘面前的人类生活的一种既丰富又深刻、既广泛又详尽的观察和理解。”说实话，一卷在手，就能给人以如此广阔而又深刻的体验的书，阅读它就像在进行一次“作出发现的伟大航行”的书，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很多的。当然，航海的无穷欢乐是伴随着无尽的艰辛而来的。谁若害怕攀登高山的艰苦与危险，谁就不能领略登上峰顶（不是“坐上”或“飞上”峰顶）的欢乐。的确，阅读这本《选集》中的《系统神学》，很需要探索的勇气和追求的毅力，很需要艰辛的思考和宽广的悟性。但是，对那些暂时没有兴趣或精力去远航大洋或攀登高山的人来说，在这本《选集》中也有一些小小的湖泊（例如《政治期望》、《爱、力量与正义》和《文化神学》），在其中畅游，会使人身强力壮；也有一些小小的丘陵（例

如《根基的动摇》、《新存在》和《永恒的现在》),在其上漫步,会使人心旷神怡。

二

这本《选集》中各篇著作的内容,读者已经可以读到;而对它们的理解,也许会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在这种理解之长河中,我的理解只是小小的一勺。因此,在这里我不想(也许是不能,同时也不必)对各篇的内容逐一评述,而只想对某些编排的考虑和相关的背景稍加介绍,然后再对蒂里希的生平及其思想中的某些主题稍作评述,以期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些许帮助。

首先应该说明,本《选集》编入的著作,基本上是全篇完整地采用,而未作任何删节(唯《系统神学》未收齐五部,但已收入的三部除“导论”之外,也未作删节)。这种打破“节选”惯例的做法,是由这些著述的特点所决定的。蒂里希在表达思想方面的一大特点,就是逻辑严密而体系完整。他的著述不是那种即兴的零碎感想之积累,而是一种周密的理性思维之行进,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不但会破坏整件艺术品似的著作之完美,还可能致使读者跟不上其思维行进的步伐,从而无法理解其几何推理似的完整的意义。确实,我在翻译《系统神学》时,也常常感觉其中很多地方句句都似格言,都可展开成一篇长文。但这种“格言”有两个特色,一是它往往有另一句对立的“格言”与之并列,不但表现出一种语言上的“对仗”,而且体现了一种思想上的“辩证”,我想,称之为“思想上的格律诗”亦无不可;二是每一句“格言”都依据前面的“格言”而成立,并提供了后面的“格言”之依据,因此,也可以说它乃是上百万言的“思想对仗”的格律诗,而不是那种一半对仗一半不对仗、并且依靠朦胧不明的形象来唤起模糊不

清的意象的八句式五言或七言律诗,至于那些凭一时机巧博酒后一笑或者以半句梦呓陪痴人入梦的批量生产的当代“格言”或“诗作”,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有人说蒂里希的思想好像一座严实的堡垒,无懈可击,难以攻破。我想,这样说也许有些过份,蒂里希自己也不会如此自负,^①但若把现在颇为流行的某些格言集或诗集比做一些小古董或小工艺品的陈列室,那么,蒂里希的著作特别是《系统神学》,是可以比做刀插不进巍然屹立的金字塔的。这正是我觉得很难将其拆散“节录”的原因。还可以补充一点:一方面,正如那些陈列室里的小玩艺可以撤下、补上、掉换、重排,某些格言或诗集也同样如此,而且更糟的是,里面的说法常常突如其来、莫明其妙、言而无据、相互矛盾,叫人无法膺服甚至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正如金字塔可以亘古屹立在黄土与青天之间,可以让人探索不已,且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蒂里希的著作也同样如此,而且通读之后,它们将不是使人得到一些片断的印象,而是会让人获得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至少可以使人去诘问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或去探索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那种收获是可以终生受用不尽的。

其次应该说明,本《选集》的编排方式,是写作年代顺序与著作形式类别二者混合的方式,即是说,把入选著作按形式分成三大类(短小的著述、讲演或讲道、大部头著作),每一类中各篇著作又按写作年代排列(有一些也不得不按出版年代排列)。这既是为了不破坏某些著名的系列性著述(即本选集第二编和第三编)的内在逻辑,不破坏对之理解所需的连续性,也是为了读者

① 他曾把自己描绘成“站在许多边界上的人”,而这样的人“体验到的是实存之各种各样的不安宁、不安全和内在的局限。他深知不可能达到安宁、安全和完善。在生活上是如此。在思想上也如此……”—On the Boundary, p. 98.

阅读和检索的方便。毕竟,比如说纯粹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在《系统神学》第二部与第三部之间插进几篇短著和一些讲道辞,看起来是很别扭的。

最后,应该对各篇著作的特色或意义作一点说明。本《选集》中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971年(即作者死后六年),这里把它排列在别的著作之前,不仅仅是因为其中的内容多写于其他著作之前(即作者移居美国之前),而且因为它表明了这位以哲学神学之系统性闻名于世的思想家有一个为人忽略的特点,即他十分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关心他周围人们的现实处境和实际生活。他一生中写了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文,这构成了他的全部成就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值得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们再读和深思的。当然,这些文章不同于一般浅薄的评论,而是从时事评论家们常常忽略的角度,即人性和历史的深度一维,从宗教的或“神律”的维度来看待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它们与他的系统的哲学神学思想不能截然分离,也可以说是他的哲学神学思想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运用。另一方面,他的系统深邃的哲学神学思考,不但不脱离时代的生活,而且可以说正是从其中生长起来的(在这方面,他同另一位20世纪神学泰斗卡尔·巴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如此,从现时代的实际生活和历史处境提出问题,到基督教的启示中去寻求回答,这种把文化与宗教联结起来的“相互关联法”,成了他的神学的主导方法,这也是他能与世俗时代许多不安于浅薄的知识分子成为“神交”的重要原因。

《存在的勇气》虽然篇幅不大,却也许是蒂里希除了《系统神学》之外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我手中的英文本是1971年版,那已是第35次印刷,而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译本所根据的是1984年版,由此可知该书重印次数之多)。这

本书在西方可以被认为是相当普及而又简明,但是首先由于语言的隔阂,再加上对存在和实存(Being 和 existence,可惜中译者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译成了同一个词)等等哲学概念的生疏,它的中文本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是很易懂的。但是如果读者参照本选集中其他的著作来理解,也许就可以减少一些理解的困难。无论如何,有一则书评说,“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为人父母者对这本书的兴趣,将不会亚于哲学家和神学家”,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不但是由于这本书的角度和思想具有高度的原创性,而且是由于它所谈的克服“忧惧”(中译者译为“焦虑”)问题具有高度的普遍性。

《爱、力量与正义》(这是专为本选集译出的)篇幅更小,但讨论的却是社会生活中更尖锐的难题,即使用强力或暴力去对付恶人与广博的爱心是否矛盾之类问题。蒂里希在这么短小的几次演讲中,能够如此清晰地阐明这种问题,如此深刻地分析这种关系而又令人信服,这至少使之堪称为这类难题百思不得其解或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又不能服人甚至不能服己的人们的良师益友。而且,关于爱、力量与正义三者统一性的这一论述,在当今的世界上无疑仍具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的意义。

《文化神学》所表现的,是蒂里希诸多原创性观念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这是他在1919年第一次发表自己的独创思想时所提出的观念。这部同样是篇幅不大的著作对当今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的“文化热”和宗教关注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长达几十年的对宗教的轻蔑和敌视之后,在现在滥用“文化”一词和误用“宗教”一词成风的社会背景下,宗教又被一些学者完全等同于文化,以致二者之间的关系被弄得十分模糊。如果人们认真思索一下《文化神学》一书的思想,恐怕不仅会澄清文化与宗教的关系,而且会更深入地理解宗教和本质的本质。这对于匡正社会文

化的无序化和过度世俗化,或者单一化和伪神圣化,肯定是十分有益的。

本选集中的《根基的动摇》、《新存在》和《永恒的现在》,是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的这三本名著的中译文。这三本书之所以著名,恐怕主要不是由于它们的“通俗”,因为蒂里希有意识地要尝试一种学术性的讲道方式,而且他的思想本来就是高度哲学性的。我想,它们之所以成为名著,毋宁说是由于它们的“动人”,而这种动人的力量,正如他的研究者(也是聆听过他讲道的他的朋友)J. H. 托马斯所说,不是来自于讲道的技巧,而是来自于“绝对的虔诚”。托马斯这样写道:“赢得你的心的,是这位讲道者那晶莹透明的诚实,而不是他的语言。确实,那不是由于他高度抽象的古典的说法,而是由于尽管如此,他却设法使人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理解人们感觉到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他直接针对人们的需要说话。他反复说明,人对自身来说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这正是他做神学家的理由。”^①我想,在现今的中国,对于厌倦于陈旧讲道的基督徒来说,对于不满于浅薄讲道的慕道者来说,对于听不到动人的人生谈话的非教徒来说,这三本书会好像沙漠里的清泉。

关于《系统神学》,前面已经说了不少。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即蒂里希自己对于这部总结性的著作十分慎重,第一卷发表六年之后,他才发表了篇幅很小(只有一部)的第二卷,第二卷发表又是六年之后,才发表了第三卷,而且是经历了很多徬徨犹豫和自我质疑才发表的。我当然希望读者不需要再等六年才读到第三卷的译本,但是对这部“当代所产生的无疑是最为丰富多彩、最富有启发性和最富于挑战性的哲学神学”(兰德德语),对这一

① Introduction to "On the Boundary", X V ■ ~ X V ■.

“在我们这个纷扰的世纪的种种希望和恐惧之中所出现的基督教和宗教思想的主要成果”(麦奎利语),我们无疑是应该多用一些时间来思索的。

三

下面来简述一下蒂里希的生平和他的思想中的某些主题。

蒂里希(Paul Tillich)这个名字系按“名从主人”原则译自其原名的德文发音,海外华人多采用的“田立克”一名则译自其英文发音,于是,出乎蒂里希自己的意料,他的生涯中最大的特点,即“在边界上”或跨越两边的特点,竟也体现在他名字的汉语译法中了!他曾经写道:“当人们要我说明我的思想如何从我的生活发展之时,我想,边界这一概念,也许就是适合的象征,可以表明我的经历和心智的整个发展。几乎在每一个关键之处,我都不得不处于不同的实存可能性之间,对其中任何一个可能性,我都不会完全如鱼得水,也都不会肯定决然反对。既然思想的前提,就是要能接受新的可能性,那么,这样一种处境对思想来说就是富于成果的;但它在生活中又是困难的、危险的,它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作出抉择,并因此而要求排除另外的可能性。这种安排及其中的紧张,既决定了我的命运,又决定了我的工作。”^①

蒂里希 1886 年 8 月 20 日生于普鲁士勃兰登堡的小村庄施塔泽德尔(即今日波兰的施塔罗西德尔)。他的父亲在埃伯尔东边一个名叫谢恩弗里斯的小社区担任路德宗的牧师。那是一个建立于中世纪的有围墙的小城,四周是肥沃的田野和浓密的森

① On the Boundary. p. 13.

林。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岁月给蒂里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历史连续性的强烈意识，对自然与人类密切关系的深刻感受，对作为社区生活中心和神圣意义载体的教会的亲切依恋。

蒂里希在中世纪古城哥尼斯堡—纽马克进入人文中学，在那哥特式的环境中，他接受了这一古典的自由思想：除了理性规则之外，不受任何东西束缚。这使他对专制保守的父亲所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怀疑。1900年他父亲调往柏林时，他更欢迎都市生活方式所带来的自由。但他对自由的热爱，并未使他忘却幼时对于一种丰富多彩而令人满意的宗教传统的执守。如何在享受探索人生的自由之时，又不牺牲有意义的传统因素，成了他思想中的一大主题。关于这点，后来主要表现在他的神学中有关“他律”与“自律”之关系，以及二者在“神律”中得到综合的论述里。“他律”指的是异己的或外在的法则或规范，在传统价值观或标准成了威胁个人自由的外来要求之处，他律就是文化的和精神的状态。自律指的是自我的或内心的法则或规范，它是对他律压制不可避免而合情合理的反抗，但它却有拒斥一切价值观或标准的倾向。神律指的是神圣的或神定的法则或规范，它展示了这样的情境：在其中，各种标准和价值观所表达的，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之信念与执守。这三种状态乃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从这时起，蒂里希努力对父亲采取独立的立场，但同父亲喜爱优秀的哲学论证一样，他同时也努力根据哲学范畴来考察个人体验。

蒂里希先后在柏林大学、图宾根大学、哈雷大学和布列斯劳大学学习。1910年，他从布列斯劳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又从哈雷大学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在哈雷大学期间，自由与传统之关系问题，在他思想中表现为路德教会的教义文件同当时的神学自由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之间的对照比较。在这个时期

的精神探索中,他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F. von Schelling)的著作和他自己的神学老师凯勒尔(M. Kaehler)的授课最有助益。谢林的自然哲学打动了蒂里希对自然的感情,它把自然解释为上帝创造精神的动态展现,其目标乃在于实现一种超越了个体生命与普遍必然之二元对立的自由。在凯勒尔影响下,他把注意力转向圣保罗所确立而路德又重申的因信称义教义。蒂里希把这项教义称为“新教原则”,并赋予它以宽广得多的意义,即不局限于罪人之释罪称义(被上帝接受)这一古典的宗教意义,而是涉及人的心智生活和一切体验。正如罪人可以在上帝眼里称义,怀疑者在对找到真理绝望之时,也可以拥有真理。因此,一般的文化生活既应受到批判的否定,又应受到勇敢的肯定;反之,对路德教义的严格公式,既可肯定其基本内容,同时又可予以否定。这些观点,以及关于“新教原则”对实在之性质和结构的意义的论述,最先见于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尤其是神学硕士论文。在后一著作之中,他阐释了谢林关于罪恶和救赎是包含一切实存的宇宙事件这一观点。

蒂里希在大学学习结束时受任圣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了4年的随军牧师。这场战争和战后德国的混乱局势使他相信,19世纪的人本主义已经垮台,以个人自律为唯一的向导已不再适当,西方文明已接近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于是他参加了宗教社会主义运动,^①但他的兴趣主要在于思想理论而不是政治运动。该运动的成员们相信,正在逼近的文化崩溃,是创造性的社会重建的重大时机。蒂里希用新约的术语称之为凯罗斯

① 有趣的是,他当时曾被称为“红色社会主义者”,而他的墓地所在的纽哈莫尼,即 New Harmony,正是著名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创办的乌托邦“新和谐”村。

(Kairos),它意指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那时,永恒之域将会插入,把世界改造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在当时,选定一种政治运动(宗教社会主义),同时就是选定一种宗教象征(上帝之国)。后来蒂里希的系统神学中的上帝之国这一宗教象征还反映了凯罗斯概念之应用:只有在具有真实的历史和政治关系时,它才能成为宗教象征。

战后,蒂里希相继在柏林、马堡、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等大学教授哲学和神学。在此期间(1919—1933年),作为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等人的同事和朋友,他积极参加了各种团体讨论,寻求对人类境况的新的理解,他发表了100多篇论文、杂文和评论,运用在哈雷大学获得的洞见来分析宗教文化、历史意义,以及政治社会等问题。1923年发表的《从主题与方法看科学系统》是他对人类精神进行系统解说的首次尝试。在这些年里,他已开始发展自己的神学体系,以回答年轻的卡尔·巴特的独特的神学。

蒂里希对自由的热情关切,使他成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最早批评者和反对者之一。1933年,他因受到纳粹党的报复而被解除教职,并被逐出德国各大学。正如他后来自嘲的那样,他乃是第一个“享此殊荣”的非犹太人学者。当时正在德国访问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力促他前往美国。在美国,他接受邀请担任了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哲学神学教授,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尽管使用一种新的语言,并使自己的思维适应实用的美国心理习惯对于他不无困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还是作为“向怀疑者传教的使徒”在美国脱颖而出,极受尊重。1955年他从协和神学院退休,旋即被哈佛大学延聘并授予“大学教授”的崇高职位。1962年他迁居芝加哥大学,该校专为他创设了一个神学特别教席。在这些著名学府中,他吸引大量的研究生和本

科生参加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探索性对话,并以自己的演讲和书籍赢得了大量的本来对宗教问题不感兴趣的听众和读者。在读者最多的两本书[即《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 1952)和《信仰之动力》(Dynamics of Faith, 1957)]中,他说明了人最深切的关切,使人不得不进而面对一个超越了人自己有限实存的实在。他在书中对人类处境的讨论表明,他对现代心理分析和实存主义哲学揭示的问题有一种极为深刻的洞察。此外,他的讲道集《根基的动摇》、《永恒的现在》和《新存在》等书,更用浅显的语言,向普通公众阐明了人的生活与终极存在之深奥的宗教联系。这些书在僧俗两界的影响,只有他在协和神学院的同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作品堪与匹敌。

1951年至1963年,蒂里希陆续发表了他终生思索的主要成果《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这部著作同卡尔·巴特的《教会教义学》一样,作为本世纪建设性神学最主要的作品之一而卓然挺立。这部巨著分三卷五部,近一百万言,第一部论理性与启示;第二部论存在与上帝;第三部论实存与救主;第四部论生命与精神;第五部论历史与神国。H. 理查德·尼布尔评论此书说:“阅读《系统神学》可以成为一次作出发现的伟大航行,这次航行所进入的,是对于在上帝的奥秘面前的人类生活的一种既丰富又深刻,既广泛又详尽的观察和理解。”那些引用蒂里希的话来支持“上帝已死”之说的现代无神论者,实际上是误解了他的本意,因为在他看来,一种不适当的(例如“神人同形同性论”的)上帝观之消失,正是对上帝更宏伟更崇高的观照或洞察之开始。

像斯宾诺莎一样,蒂里希是一个为“上帝而陶醉的人”,他终生的努力,都是要帮助自己的人类同伴重新获得一种与人共有并富于动力的宗教信仰。尽管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蒂里希曾对